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

丛书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

刘放桐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

丛书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

刘放桐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刘放桐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3
(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研究/刘放桐, 陈亚军主编)
ISBN 978-7-309-13260-1

I. 实… II. 刘… III. 实用主义-研究-美国 IV. B71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28277 号

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

刘放桐 著
责任编辑/方尚岑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8.25 字数 372 千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260-1/B·641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出版基金
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
资助出版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杜威研究与《杜威全集》翻译”

（项目批准号：12&ZD123）成果之一

总序

刘放桐 陈亚军

在西方传入中国的诸多哲学思潮中,若论影响之巨大,经历之坎坷,除马克思主义外,大概没有哪一个可以和实用主义相比。从一百年前的热捧,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鞭笞,再到近二三十年来的正视,中国思想学术界对待实用主义的姿态,经历了令人晕眩的大转变,其中折射出国人对待实用主义的复杂心态。不久前《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的问世,向人们传递出这样一个消息:经过老一辈学者的筚路蓝缕、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学界对于实用主义的译介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用主义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值此时刻,人们自然会问,如此关注实用主义,意义何在?我们的回答是:

首先,实用主义乃美国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础。从开国元勋到民主、共和两党领袖,从心系国家大事的硕学鸿儒到只关心衣食住行的贩夫走卒,美国人所奉行的基本哲学,归根结底,是实用主义。可以说,要弄清当今美国的社会、思想、文化,乃至政治、法律、外交等等,离开对实用主义的深入理解,只能停留在皮毛。欲了解美国,不能不了解实用主义。

其次,实用主义乃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先驱。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向,说到底,就是理性主义传统向实践主义传统的转向,知识论传统向生存论传统的转向。二元式的思维方式被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所取代,对超验世界的眷恋被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所取代。在这一转向中,实用主义和马克思、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相互呼应、殊途同归。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从研究实用主义入手,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再次,实用主义乃中国传统哲学的知音。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中国

哲学从来没有产生出建立在二元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表象主义。中国哲学传统所关注的天人合一、生活世界及伦理实践出发点,与实用主义有着极其相近的旨趣和追求。研究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异同,既有助于增强中国哲学的自信,也有助于改进中国哲学的缺憾。

最后,实用主义乃马克思主义的最佳对话者。同为现代哲学转型的典范,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有着大体相似的主张。它们从同一个方向批判西方哲学传统,又从同一个方向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虽然途径有差别,话语有不同,观点也不无分歧,但它们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研究实用主义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有助于看清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生命力,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思想资源。

与绝大多数其他西方哲学形态不同,实用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学院派哲学。这不仅表现在实用主义者们拒斥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割裂,而且也表现在实用主义深深影响了美国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事实。杜威在这一方面堪称表率。他的哲学早已越过学院围墙,渗透到美国文化土壤的方方面面。实用主义与美国思想文化紧密相连,唇齿相依。一方面,固然可以说,理解美国思想文化不能不理解实用主义;而另一方面,也必须说,理解实用主义不能不理解美国思想文化。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实用主义不可与研究美国思想文化脱钩。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研究系列的视野,比起一般的实用主义研究,要更加开阔:实用主义是这一视野的焦点,而美国思想文化则构成了这一焦点的“穗边”。

或许应该说明的是,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实用主义虽然起源于美国,但绝不限于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尼采就已经被称作“德国第一位实用主义者”,而法国的柏格森与实用主义者的思想上的相近,也在他与詹姆斯的相互欣赏中表露无遗。再后来,无论是英国的维特根斯坦,还是德国的海德格尔、哈贝马斯、阿佩尔、伽达默尔,或是法国的福柯、德里达,无不透露出浓重的实用主义气息。称不称他们为实用主义者,其实无关紧要。实用主义早已存在“在那里”,对于它的“在那里”的研究,同样是本系列所

欲涵盖的。

本研究系列旨在全面展示我国学术界实用主义乃至美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对话与交流、切磋与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支持,就不会有本系列研究成果的及时问世。

最后,我们也期待着学术界各位同仁的鼎力相助。让我们共同努力,将我国的实用主义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序 言

我对实用主义的关注较早。受到 1955 年开始进行的那场从上到下的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的触动,我当时就有过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实用主义的想法。除了阅读了一些实用主义的材料外,还阅读了一些更为广泛的西方哲学的材料。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都使我不可能对实用主义有合乎实际的了解,但却由此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兴趣。1956 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教育领域尝试恢复学位制度。中国科学院和少数重点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尝试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我由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作西方哲学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转入西方哲学专业后,我需要补哲学基础课程、特别是西方哲学的基础课程。在后来的许多年内,我并没有多少时间去专门研究实用主义。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几乎被全盘否定。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敏感性又最强,我自然也不敢多涉及实用主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得到恢复。我个人在研究中感到,从马克思主义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角度说,实用主义也许最具有典型意义。因此,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的十多年中,我一直把实用主义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总是力图能有某些创新和超前意识,但又不敢贸然超越国内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底线。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初期,我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当时仍居支配地位的“左”的批判框架下进行的,但又力图尽可能使之具有某些求实的内容,肯定它在某些方面的合理性。当时发表的一些关于实用主义的论文以及 1983 年出版(1981 年成稿)的《实用主义述评》都是如此。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仍

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批判框架,但又在尝试能否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当时为了编写皮尔士、詹姆士、杜威、胡克的评传,我又重新阅读了实用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杜威的原著,深感旧的批判框架与杜威等人的理论的实际所是相差甚远。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应当对实用主义重新进行评价。在写这些评传时虽然仍未敢摆脱旧的批判框架,但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思考,特别是材料上的准备,期望在时机成熟时能实现某些突破。经过几年的酝酿,我在1986年终于写成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该文以分节标题的醒目的方式(“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对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流行了半个多世纪、被认为不可动摇的权威论断作了公开和全面的否定。为了尽可能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麻烦,我当时还只是想在同行专家的小范围内试水,不愿有过多张扬,因此将此文发表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以书代刊的《现代外国哲学》(1987年出的第10辑)上。也许我的这种观点体现了同行专家的共同心声,发表后引起了他们的广泛共鸣。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趁势于1988年在成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实用主义讨论会,我的见解与许多同行专家的观点不谋而合,并为他们进一步论证和发挥,大体上成了我国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大部分学者的共识。这次全国讨论会事实上成了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使这方面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求实评价的新时期。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致力于把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扩大到重新评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又是经过几年的酝酿,我在1996年发表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其中明确提出了如下两个观点:第一,由西方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不是由进步转向反动、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型,它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第二,这一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虽有原则区别,但在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存在的种种局限性、建立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

二者殊途同归。后来陆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论文(大都由《新华文摘》转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 2002 年)、《中国的现代哲学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国 RVP 英文版 2004 年)、《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探索、沟通和超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证和发挥。这两个观点同样是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阵营长期流行的权威观点的否定,它们的提出对后来在我国兴起的马哲西哲比较研究也起了一定的激进作用。

从 21 世纪起,在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同时,我又把比较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对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的研究。在我的倡议下,2004 年在复旦大学成立了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其第一个特大型课题是组织国内著名专家参与翻译 37 卷本《杜威全集》(外加 1 卷索引和 1 卷补遗),为深入地研究杜威各方面的理论提供全面、可靠的文本。与此同时,我们已开始对杜威哲学的重新研究。又是经过多年酝酿,我在 2005 年发表了《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一文。该文把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杜威哲学的根本意义是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第二,杜威的哲学的改造适应了西方哲学现代变革的潮流;第三,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殊途同归。这种提法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杜威哲学的简单否定的评价,而且对杜威哲学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哲学而作了高度肯定。特别是指出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有原则区别,但在体现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此文还只是我们的重新研究的开始,我们将与杜威全集的翻译相结合,开展深入具体的研究。最近两年来,我又陆续写了几篇有关杜威的文章。新近完成的《再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将进一步将对杜威等人实用主义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实践的转向是现当代哲学的根本性的转向,马

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对立统一是当代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等新观点。

在中国从事杜威和实用主义的研究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的现实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揭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由此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发生过和可能发生的影响。关于杜威和实用主义过去发生过的影响,国内已有一些专家作过富有成果的研究,我个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还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至于如何估计杜威和实用主义未来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影响,除了准确地认识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和文化发展背景外,最要紧的还是进一步研究杜威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现代意义,特别是它们在什么程度上和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现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我们已经从事过、还将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能取得较好的成果。

《实用主义的研究历程》书稿大体编辑完成了。从构成说,它是由不同时期独立成篇的论文汇集而成,但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各篇章之间有着一定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它也可算是一部相对完整的专著。它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和认识的发展历程。尽管个人的研究和认识存在着很大局限性,只是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的全豹之一斑。但从这一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看出这一时期我国实用主义研究的曲折而又毕竟存在的进步。这也正是本书可能存在的价值。

刘放桐

2014年5月25日

目 录

001 / 序言

第一编 在传统批判框架内恢复对实用主义的研究

002 / 引言

005 / 第一章 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传状况

037 / 第二章 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和方法论

065 / 第三章 实用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102 / 第四章 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胡克评传

第二编 循序渐进，迈向求实研究

148 / 引言

152 / 第五章 皮尔士评传

186 / 第六章 詹姆士评传

224 / 第七章 杜威评传

257 / 第八章 米德评传

269 / 第九章 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289 / 第十章 《重新研究实用主义》引言和序

300 / 第十一章 实用主义研究的六十年轮回

315 / 第十二章 重新认识和评价杜威

第三编 实用主义与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

324 / 引言

328 / 第十三章 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
哲学的发展道路

344 / 第十四章 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理论分析

370 / 第十五章 美国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及其近代变更

385 / 第十六章 从美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看其近代转型

398 / 第十七章 皮尔士与美国哲学的现代转型

421 / 第十八章 再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第一编

在传统批判框架内恢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那场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以来,实用主义一直被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诡辩哲学”“市侩哲学”。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学界没有人怀疑,但由于这种定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威意义,因此几乎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理论领域可谓是百废待兴,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本身的理解上拨乱反正,特别是纠正“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目张胆和篡改以及“凡是派”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扭曲,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由此而受到高度重视。至于其他领域,都只能在服从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的前提下开展一些初步的恢复和准备工作。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也是如此。1978 年和 1979 年分别在芜湖和太原举行关于西方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在我国都是第一次,它们对在我国恢复西方哲学史和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一些专家甚至在会议上建议对长期在我国哲学史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所谓斯大林—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重新加以认识,克服它的不当之处,并要求重新讨论和确定哲学史的定义,以便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这种建议毕竟还是较温和的。一涉及对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具体评价,大家还不得不有所克制,因为在这方面当时的禁忌还很多。就对实用主义的具体评价来说,情况更为困难。这大概与当时对“四人帮”的哲学基础的批判有关。

“四人帮”覆灭后,哲学界许多人纷纷就他们的哲学基础提出种种看法。其中得到认同最多、在哲学界谈论得也最多的是认为“四人帮”的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有的专家还从张春桥和姚文元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参加过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对实用主义有所了解来作为他们自觉地贩卖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根据。当然也有其他一些提法,例如有的人认为“四人帮”的理论基础是唯意志主义。不过总的说来,认为是实用主义的占明显优势。有的专家还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从以往人们对实用主义所作的解释来说,这些专家把实用主义看作是“四人帮”哲学的理论基础未尝没有道理。问题在于以往对实用主义的解释是否客观和准确以及“四人帮”是否对实用主义实际所是作过研究或者至少是否有较多了解。这不是按照传统理论模式写几篇文章所能讲清的,应当对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重新作出研究,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当时发表的一些阐释实用主义的文章着重点还在延续以往的批判。根据对实用主义的重新研究、并对之作出新的解释的文章很难找到。

我个人对实用主义的研究起步算是较早的。20世纪50年代我就已开始接触实用主义的原著,对当时的一些批判文章不敢苟同。虽然还没有按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对之作出较为客观的解释的能力,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但当时想到过以较“合法”的形式尽可能对实用主义作出一些相对客观的阐释。由于在“文革”前我在复旦大学曾以“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开设过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并写成了相当部分流派的讲义。“文革”期间停顿。“文革”后我立即有了重新把讲义写完的打算,争取能成为一部教材。在当时大批判的氛围尚未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我当然只能按照旧的批判模式来写,如果能在某些方面突破简单的批判模式而能容纳一些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的实际内容,我自己就会感到有几分满足了。这倒不是为自己无能作辩护,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从个人的能力来说还是思想文化环境来说,我最多也只能做到如此地步。要写出现代西方哲学教材,实用主义当然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它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被简单否定,它之被当作“四人帮”的哲学基础更增加了对它作出客观评价的困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对实用主义同样暂时沿用传统的批判模式,尽可能列出一些关于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的内容,在能够作出某种肯定而又不致存在风险的地方对它们作出某些肯定。这样既可不被那些坚持旧的

批判模式的人士指责为离经叛道,又可适当提出一些有关实用主义的较新的内容。与同时期那些批判“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的论著比,我的论述也许算是最开放的了。但采用的毕竟还是一种仍有较大保守性的批判模式,这对我个人当然是一种悲哀,在一定程度上毋宁说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从“十年动乱”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陆续发表了《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批判》(《复旦学报》)、《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文科教学》)、《实用主义的实践观述评》(《现代外国哲学》)、《论詹姆士的激进经验主义》(《外国哲学》)、《实用主义的天才论述评》(《现代外国哲学论集》)、《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用主义——胡克哲学述评》(《复旦学报》增刊)等论文。这些论文谈论的其实都是我当时撰写的论著《实用主义述评》的内容(《述评》出版于1983年,但成稿是1981年,出版前只作过少量修改)。考虑到《述评》中对有关问题的交代较为清楚,因此我在本书中选用了《述评》中的四章:第一章,实用主义的产生和流传状况;第三章,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和方法论;第五章,实用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第六章,实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其中最后一部分取自我后来写的胡克评传)。该书中的经验论和真理论两章更为重要,因下一部分中选用的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评传中对这方面有更为具体的论述,这里就从略了。

《述评》和上述论文都是在旧的批判框架下写出的。这与我1981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大体一致。其中所表达的观点与我后来在经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重新研究以后得出的观点自然有很大差别,其中不少观点正是我后来力图超越和克服的。无论对我个人或我国哲学界而言,这些观点大都已过时。但是,它们不仅体现了我个人对实用主义研究的一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大概也体现了我国哲学界在那个阶段对实用主义研究的大体方向。对年轻读者来说,了解那个阶段的状况也许是有益的。